

霸权阴影下的战略选择^{*}

韦宗友

在国际政治中,一个经常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面对一国权力的急剧增长以及由此产生的霸权威胁。长期以来,现实主义的均势理论一直提供着这一问题的“标准答案”:其他国家将通过提高自身权力,或在自身权力不足时与他国结盟来应对威胁,以确保自身的安全与生存。结构现实主义的代表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 Waltz)明确地指出,在无政府结构下的压力下,“制衡而非追随才是体系所鼓励的行为”^①。

然而,无论是回顾历史还是直面现实,我们都不难发现,在面临霸权或普世性帝国的危险时,国家并非倾向于奉行制衡政策,在很多情况下国家总是设法推卸责任、避免介入冲突,甚至会追随霸权觊觎者。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国家行为背后的根源是什么?国家在进行这些抉择时,哪些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的政策选择对一国的生存与福

* 衷心感谢朱明权教授对本文的悉心指导以及两位匿名评阅者的宝贵意见,不过文中的任何错误或不当之处当由作者自负文责。

^①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p. 125—126.

《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4期(总第4期),第52—81页。
Scienc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社会产生什么影响,其利弊得失如何?这些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分析以沃尔兹为代表的均势理论的主要观点,着重指出该理论存在的逻辑和历史缺陷;第二部分提出了本文的主要理论假设,揭示国家行为背后的限定因素;第三部分以中国战国时期“七国争雄”的历史案例来检验第二部分提出的理论观点;第四部分是对研究工作的总结。

一、沃尔兹的均势理论及其批判

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除了确立结构现实主义的分析方法外,还着重建构了基于结构的均势理论。他指出,国际政治是一个以权力为基础的无政府状态,各国处于霍布斯(Hobbes)所描绘的“自然状态”,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这种生死存亡的竞争压力,一方面要求体系的单元竭力“模仿”那些成功的国家或行为,从而不断被“社会化”,国家愈益成为“相似的单元”;另一方面,当某一国势力急速增长时,各国将会奋力增加本国的实力,或在本国的实力不足时联合其他国家共同对付潜在的称霸者。其结果是均势一再形成,霸权的企图遭受挫败。在此,无政府结构恰似经济学中的“无形之手”,它通过奖励某些行为、惩处另外一些行为而对行为体进行“选择”,而均势则是追求私利的行为体在这一“无形之手”的“选择”压力下所获得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产品”^①。

根据均势理论,沃尔兹进一步引申指出,国家将更多地奉行制衡而非追随政策,制衡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行为的主要特征。他写道:“如果次要国家有选择的自由,它们会纷纷加入弱势一方。”^②他自信地声称:“只要满足了两个条件,均势政治就会大行其道:秩序处于无政府状态,秩序下生活着希望生存的单元。”^③

沃尔兹的均势理论虽然具有简洁、明晰的优点,但它在解释力方面存在严重不足。结构均势理论尽管可以勉强解释几个世纪以来试图问鼎欧洲大陆霸

^①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p. 88—93.

^② *Ibid.*, pp. 126—127.

^③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21.

权的国家(如路易十四的法国、拿破仑帝国、威廉德国、希特勒德国),最终为什么都以失败而告终,大陆体系得以大致恢复某种均势;但如果深究会发现,在每一次反霸过程中,都存在着大量的非制衡行为,有的国家试图置身事外,有的国家甚至追随霸权觊觎者。从冷战后的国际政治行为来看,美国雄踞世界权力的巅峰,可非但没有出现均势理论所预期的制衡局面,反而出现了大量追随美国霸权的行为。此外,如果考察非欧洲体系,我们发现均势并非具有普遍性,霸权或帝国的建立也是一种可能的国际政治图景。比如,中国古代的战国时期,“七国争雄”的结果并非“七雄并立”,而是秦国最终消灭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帝国。

沃尔兹的均势理论观点不断受到学者的质疑和批判。其中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L. Schweller)和保罗·施罗德(Paul Schroeder)等人的批判最具代表性。

沃尔特指出,在国家的结盟决策中,权力并非决定性因素,威胁才是导致国家选择联盟的终极因素。如果一国认为他国对自己的安全与生存构成重大威胁,那么即便后者并非具有权力优势的国家,它也会采取制衡行为。相反,如果它认为某一国对其安全与生存不构成威胁,那么即便后者是具有权力优势的国家,它一般也不会采取制衡行为。通过对中东、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间的联盟关系、东南亚以及欧洲 20 世纪 30 年代联盟关系的广泛考察,沃尔特得出结论:第一,国家制衡的是威胁,而非单纯的权力;第二,在国际政治中,制衡行为远远多于追随;第三,追随只是弱小国家针对特殊情况的暂时措施,不具有普遍性。^①

施韦勒则将“修正主义国家”概念重新引入现实主义的话语体系。他认为,世界并非由“清一色”的现状国家构成,而是存在着现状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前者是现有体系的受益者,致力于“维护自身在体系中的地位”,是心满意足的国家;后者则是现存秩序的受害者或“局外人”,是现状的“修正者”^②。前者将会制衡那些对其安全及体系的稳定构成威胁的国家和国家联盟,它们是

^①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21—22, 29—33, and 148—152.

^②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1994, pp. 87—88.

“安全最大化的国家”；但对于后者而言，最重要的是打破现存秩序，谋取额外的利益，因而会追随致力于重建新秩序的修正主义大国，它们是“权力最大化的国家”^①。

施韦勒指出，如果仅仅从现状国家的视角看问题，就无法对修正主义国家的行为做出解释。因为固守现状偏见，导致沃尔兹对修正主义国家的追随行为视而不见，并从根本上排除了对追随行为的理论考察。^② 他进一步分析认为，制衡是一项代价极其高昂的行为，而追随往往能够获得额外的利益，修正主义国家为打破现状往往愿意承担较高的成本，因而追随要比制衡更为常见。^③

历史学家保罗·施罗德主要从实证的角度对沃尔兹的制衡观点提出了批评，认为它与欧洲几个世纪以来的外交实践不相符合。^④ 他指出，1648年以来的国际政治行为的特点是，在每一次重大的国际冲突中，制衡都不是最主要的行为，追随比前者更为常见，不仅小国如此，大国亦然。国家不愿意制衡的根本原因在于，制衡的成本太过高昂，绝大多数国家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无法承担，它们宁愿选择其他代价较低的战略。施罗德认为，在面对威胁时，国家具有制衡、躲避、超越、追随等多种选择，制衡是最不常见且往往是最后的选择，而追随或躲避要常见得多。^⑤

针对诸多学者的批判，沃尔兹给予了回应。他指出，理论并非现实的镜面反映。“将过多的实证内容塞进理论中……将把一个一般理论变成了一种对特殊性的解释。”只有当“国际政治理论转向对外政策应用时，才需考虑诸如决策者对威胁的评估之类的因素，但它们并不能因此而成为理论的组成部分”^⑥。沃尔兹承认，在现实环境下，国家有时的确可能会奉行追随政策，“非常虚弱的国家无法以自身的能力来确保安全。无论有何风险，它们的安危可能主要系于

① Randall L Schweller, *Deadly Imbalances: 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Chapter 1.

② Randall L Schweller, "New Realist Research on Alliances: Refining, Not Refuting, 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 December 1997, pp. 928—929.

③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pp. 89—104.

④ Paul Schroeder, "Historical Reality vs. Neo-Realist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1994, p. 115.

⑤ Ibid., pp. 117—124, 133—147.

⑥ Kenneth N. Waltz, "Evaluating Theor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 1997, p. 916.

追随强者”，“国家在应对内外压力时，有时可能会铸成大错”，规律有时也会被打破。但是，他认为，如果国家违背了国际政治的基本规律，将会受到惩罚：尽管惩罚可能并非立竿见影。^①

沃尔兹的回应激起了更多的批评。针对冷战后国际政治中出现的新情况，威廉·沃尔福斯(William C. Wohlforth)、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托马斯·里斯(Thomas Risse)等学者分别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建构主义等视角对沃尔兹的理论观点进行了批判。^②此外，一些学者对沃尔兹将对外政策排除出均势理论的考察范围表示了不满。比如，汉斯·莫里岑(Hans Mouritzen)抱怨说，一方面，沃尔兹声称既要解释国际政治的结果(如均势的循环往复)，又要解释国家的行为(如制衡)；另一方面，又过于苛求地将解释国际政治结果的理论定性为国际政治理论，将解释国家行为的理论称为对外政策理论，把国际政治中并不少见的追随行为排除出体系理论的解释范畴之外，将之归于对外政策理论或纯粹的“例外”，从而使自己的理论成了无法证伪的东西。^③

二、制衡、追随与不介入：霸权阴影下的国家反应

从逻辑推理来说，在一个“自助”的无政府国际舞台中，由于竞争的压力和环境的不确定性，制衡他国权力的急剧增长或霸权企图，无疑是一项理性的对外政策，长期忽视体系压力的国家最终很可能被淘汰出局。但问题是，生活在国际政治“丛林”中的国家，并非孤立的“弹子球”，它们的战略决策是在“相互依赖”的环境中做出的，而非在“实验室”里做出的。威胁源的远近、决策者对威胁的认知、国家间战略的“相互依赖”、权力差异等等，都会对具体的行为产生影响。此外，决策者的行为还受到自身经验、历史、认知等多方面的限制，不可能完全预见体系内其他国家的行为，因而其对外政策不可能做到“完全理

^① Kenneth N. Waltz, "Evaluating Theor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 1997, p. 915.

^② 详见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韩召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 Hans Mouritzen, "Kenneth Waltz: A Critical Rationalist Betwee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in Iver B. Neumann and Ole Waever, eds.,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sters in the Making?*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p. 78—79.

性”，往往追求的是“满意的”结果，而非“最佳方案”。

综合上述诸多学者的观点，本文提出，在面临霸权威胁时^①，体系内的国家具有三种战略选择：制衡、追随以及不介入。所谓制衡，是指国家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来平衡霸权威胁，它既包括战争行为，也包括政治或军事上的结盟。所谓追随，则是指与霸权国或霸权觊觎者结成政治或军事上的联盟，或是在冲突中加入到霸权国或霸权觊觎者一方。所谓不介入，是指既不加入到霸权（觊觎）国一方，也不加入到制衡霸权（觊觎）国一方。不介入的外延较为宽泛，它可以是与霸权冲突方“保持距离”以“躲避威胁”；可以是“等待观望”，以便在最有利时机介入冲突；也可以是奉行“孤立政策”，洁身自好。换言之，它涵盖了学者们所提到的制衡与追随外的诸多行为反应。^② 鉴于制衡的高昂成本以及追随和不介入在缓解眼前安全压力上所具有的优势，从体系范围来看，追随和不介入要远比制衡常见。

接下来，将具体考察限制国家对外战略选择的变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主要理论观点和命题。

（一）结构层次因素

在结构层次上，本文主要选取两个因素：无政府状态以及体系的极。

（1）无政府状态。在沃尔兹的理论中，无政府结构被视为一个常量。它仅意味着缺乏统一的中央权威。然而，正如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所指出的，无政府结构并非是个常量，而是一个变量。无政府结构不仅仅意味着缺乏中央权威，更意味着造就这一结构的“共有观念”，即文化。不同的“共有观念”造就了不同的无政府文化，产生了不同的无政府逻辑。在“霍布斯式的”文化结构下，国家将彼此视为“敌人”，战争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常态；在“洛克式的”文化结构下，国家将彼此视为“对手”，战争虽不是常态，但也并未完全废

^① 本文所谓的“霸权威胁”，主要是指霸权国或权力激增的国家对整个体系结构以及体系内的其他国家所构成的总体威胁，并非特指该国对某个具体国家的威胁。

^② 参见 Schweller, *Deadly Imbalances: 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chapter 3; Robert Powell, *In the Shadow of Power: States and Strate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56;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chapter 5.

弃;在“康德式的”文化结构下,国家视彼此为“朋友”,不再用战争来解决彼此间的争端。^①

这三种不同的无政府文化结构,对国家对外政策行为的影响表现在:① 在霍布斯式的文化结构下,由于彼此视对方为敌人,“囚徒困境”问题十分严重。当面临霸权威胁时,国家间很难建立起有效的合作制衡联盟,“背叛”行为十分常见,便于霸权觊觎国各个击破。② 在洛克式的文化结构下,由于彼此相互承认主权,是竞争性的对手关系,当遇到霸权威胁时,就有可能建立起制衡霸权的联盟。然而,由于对威胁的不同认知以及缺乏有效的强制手段,在制衡霸权时往往会产生“集体行动的难题”,导致反霸努力的低效甚至失败。^③ ③ 在康德式的文化结构下,国家视彼此为朋友,不会威胁彼此的安全,形成了一个安全的共同体,不再相互制衡。^④ 当这一安全共同体受到外部威胁时,将会共同制衡。

(2) 体系的极。按沃尔兹的定义,体系的极是指国际权力分布的状态,很大程度上是大国的数目^⑤,不同的极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是不同的。具体地说,第一,在单极体系中,由于单极体系的权力分布极端倾斜,近乎等级制。在权力落差巨大的情况下,国家是不会贸然选择制衡的,制衡非但没有获胜的希望,反而会招致霸权国的敌意和报复,成本太高。相反,追随霸权国有可能从它那里获得一些额外的好处。^⑥ 如果采取不介入政策,也可以避免与霸权国的正面冲突,并可拉开与霸权国的距离,以便“洁身自好”,维护本国的“荣誉”,甚至可以借机标榜正义。

第二,在两极体系中,对于两强而言,制衡对方、防止对手谋取世界霸权始终是它们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为此,它们除了主要依靠自身的努力来进行制

①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3—383页。

② 关于“集体行动的难题”对于制衡的消极影响,参见韦宗友:《集体行动的难题与制衡霸权》,《国际观察》2003年第4期。

③ 托马斯·里斯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参见托马斯·里斯:《自由安全共同体的美国权力》,载于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第267页。

④ Waltz,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2, 1993, p. 73.

⑤ 类似观点,请参见威廉·沃尔福斯:《单极世界中的美国战略》,载于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第98—118页。

衡外,也不放弃争取盟友来制衡对手^①,这就给体系中其他国家的追随行为提供了机遇。而“两强”也愿意提供一些利益以吸引潜在的追随者,鼓励它们投向自己,以便在这场霸权争夺中成为最终的赢家。当然,一些不愿意卷入“两强”间的权力争夺的中小国家,将倾向于奉行不介入政策,也能维护本国的安全与独立。因而,在两极体系中,制衡、追随以及不介入三种政策行为都会出现。制衡常常是两强之间的典型行为,此外,体系内也存在相当多的追随以及不介入行为。

第三,在多极体系中,追随和不介入要远比制衡常见。在权力分布相对分散的多极体系中,任何一国都无力单独问鼎霸权。即使其中某一国具有霸权企图,也较容易被挫败,制衡的成本相对较低。^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制衡将成为主导行为,因为多极体系也存在着一些重大的不利于制衡的因素,“在多极体系下,由于极太多,敌友界线不明,也无法确切知道体系中所发生的事。……因而,存在着推卸责任……的倾向”^③。在多极体系下,由于面临制衡霸权的集体行动难题,每个国家都有搭便车的动机,希望他国制衡,而自己坐收渔利。当每个国家都如此思考时,那么要么没有国家制衡霸权觊觎者,要么只有极少数国家起而制衡。

但是,极的影响是间接的,它主要的作用还是“塑造”和“选择”而非“决定”国家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在同一极下,会出现诸如制衡、不介入乃至追随三种彼此截然不同的行为反应的原因。

(二) 互动层次因素

(1) 权力对比。权力对比与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主要是指相互作用的两国或多个国家之间在权力总量(尤其是军事力量)上的强与弱、大与小的比例关系,是属于互动层次的变量,而后者则是体系范围内的权力分布状态。相对于后者,前者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更为直接,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大国

① Waltz,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73.

② 即巴利·勃森(Barry Posen)等人所谓的“防御占上风”,详见 Barry Posen, *The Source of Military Doctrine*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③ Ted Hpf, "Polarity,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5, No. 2, 1991, p. 476.

与小国的行为差异。从国际政治的视角来看,虽然国家在功能上没有多大的区别,但在能力上却大相径庭。这种能力上的差异,反映到具体的行为选择上,就会呈现出重大的差别。例如,同样是面临霸权威胁,大国与小国的反应并不一样。正如罗思斯坦(Robert L. Rothstein)所言,小国的行为有自己不同于大国的特点:① 小国很少能独自解决安全困境问题,而是需要外部力量;② 因为只拥有极小的安全空间,所以行为必须十分谨慎。尽管这可能危及其长期的稳定,小国被迫眼睛只盯着短期和本地事务。^① 而对大国来说,其利益不仅仅是本国的生存,更“外溢”到本地区甚至整个体系的稳定与安全。当出现威胁到地区或整个体系稳定的霸权觊觎者时,体系中的大国会首先起而制衡霸权觊觎者,大国也往往会出于“荣誉”或“声誉”的考虑,制衡可能的霸权觊觎者。

对于大国来说,追随是得不偿失,也是不受欢迎的行为,因为霸权觊觎者的霸权图谋必然与大国的既得利益相冲突或至少对其不利。当然,如果该大国是对现状不满的修正主义国家,则另当别论。诚如施韦勒所言,如果它们自身无力单独挑战现存秩序,就会乐得追随一个更具威力的霸权觊觎者,借以分享建立新秩序的成果。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意大利就曾扮演过这种角色。

对小国来说,制衡的成本太高,一次不成功或失算的制衡往往意味着灭顶之灾。而且,小国的利益范围相对狭窄,往往局限于本国之内,即使“外溢”,也极其有限。小国更不会受到“名誉”的拖累,因而,不介入和追随是较为常见的行为选择。

第二,霸权觊觎者与反霸一方因权力对比的差异而导致的的行为差异。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若霸权觊觎者与反霸方的权力相差不大,则制衡的动机大大增强,制衡行为较为常见。若两者间力量对比悬殊,则制衡的可能性大大减弱。因为,在此情况下贸然制衡,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因而,它们比较倾向于搭便车甚或背叛,不介入和追随将是较为常见的行为。

(2) 地理位置。地理位置是一国生存的空间环境,属于“互动层次因素”。地理位置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权力投送的效能发生的。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N. Boulding)、奥沙利文(Patrick O'Sullivan)等学者指出,

^① Robert L. Rothstein, *Alliances and Small Powe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24—26.

权力在投送的过程中存在“力量损失梯度”，力量投射离本国越远，投送的费用就越高，抵达目标地的有效实力也就越少；相反，距离越近，权力投送的成本就越低，权力的效能也就越高。^①因而，国家会特别警觉邻国权力的增长，而对遥远国家权力的变动不太在意。而且，由于地理位置的相邻，利益的交错点也会相对增多，虽然有利于彼此的合作，但同时也增加了利益冲突的概率，有可能出现沃尔特所说的国家倾向于制衡身边的强权而非制衡体系内最强国的现象。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地理位置对一国对外政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① 远离霸权冲突或具有独特地理环境（如为广阔的水域或高山险峰所阻隔）的国家，由于对方或本国投送权力的成本巨大，较倾向于奉行不介入政策，以静观局势变化；② 面临强邻威胁的大国较倾向于奉行制衡政策，但对于面临强邻威胁的小国来说，制衡的风险太大，在缺乏坚强的外部援助的情况下，一般会奉行追随政策。

（三）单元层次因素

这里主要讨论决策者的观念。无论是无政府结构、体系的极、权力对比，还是地理位置，都要通过决策者观念的“过滤”，才能形成最后的战略决定。观念有时候是对某一事物或形势的正确认识，但很多时候也可能是对事物或形势不正确，甚至错误的认识，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将后者称为“错误观念”。杰维斯指出，无论是正确观念还是错误观念，一旦形成，都必然会对决策产生影响：“一旦某人对对方形成了某种印象尤其是敌对印象，那么各种信息，即使是模糊的、不一样的信息都会被用来强化这一印象。……如果他们认为某一国具有敌意，那么某些在他国看来是中立的，甚或友好的行为也将被有意忽略、歪曲甚至被视为恶意欺骗。”^②他断言：“许多重大的政策分歧，其根源就在观念上的不同。”^③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在对1865—1940年间欧洲的

① 奥沙利文：《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李亦鸣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1—12，70—73页；Kenneth N. Boulding, *Conflict and Defense: A General Theor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2)。

②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68.

③ Ibid., p. 31.

联盟政治进行考察时指出,决策者的观念会对一国的联盟行为产生重大影响:“如果领导人错误地估计了权力分布,他们在一场冲突的紧要关头可能会袖手旁观,可能会对无足轻重的威胁做出过分反应,甚至有可能会帮错对象。如果领导人将强国误认为是弱国,他们甚至会加入到强大的一方,结果他们的行为更像追随而非制衡。”^①冷战期间,对共产主义根深蒂固的偏见以及对“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担忧,曾极大地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引发了诸多本可以避免的危机和冲突。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若决策者认为霸权覬覦者极具侵略性,则他们倾向于奉行制衡政策。因为对于这种“贪得无厌”的国家来说,每一次让步只会激起其更大的贪欲,若不抵抗,最终只会被其消灭。若决策者认为某一霸权覬覦者是“仁慈的”,或不太具有侵略性,则他们可能会奉行不介入甚至追随政策,因为这样做一方面可避免激起霸权覬覦者的愤怒,另一方面则可因时而动,趁机谋取利益。

通过以上的论述,本文的基本理论观点及假设可以概括为:第一,在面临霸权威胁下,国家基本上存在三种行为选择——制衡、追随以及不介入。第二,在上述五大变量的单独或共同作用下,面对霸权威胁时,国家表现出明显的“有限理性”倾向,虽然存在制衡行为,但并非如沃尔兹所预言的那样成为体系内的主导战略,追随与不介入是更为常见的战略选择。第三,不同的无政府文化结构,塑造了不同的结构逻辑。在霍布斯式的文化结构下,由于严重的“囚徒困境”问题,制衡战略难以成功,追随及不介入行为随处可见;在洛克式的文化结构下,虽不存在严重的“囚徒困境”问题,但制衡联盟受到“集体行动难题”的困扰,追随及不介入也十分常见。制衡霸权的努力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化解“集体行动难题”的能力。在康德式文化结构下,威胁不是产生于内部而是外部,当遇到外部威胁时,它们会以安全共同体的方式加以制衡。第四,在同一极中,权力相当的国家倾向于制衡对方的称霸企图,实力孱弱的国家在缺乏坚强的外部援助或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时,会倾向于奉行追随政策。第五,拥有独特地理位置(如四周为水域阻隔的岛国或为高山险峰荫庇的国家)或远

^① Thomas J. Christensen, “Perceptions and Alliances in Europe, 1865—1940,”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1, No. 1, 1997, p. 68.

离祸端的国家,无论是大国或小国都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奉行不介入政策。第六,若霸权覬覦者被认为是一个“仁慈的”国家,则国家制衡的动机可能会大大减弱,追随及不介入将极为常见;若霸权覬覦者被认为是个“邪恶的”国家,则制衡的动机大大增强。

三、中国: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

(一) 等级制的崩溃与“七雄并立”

西周初期,周王室利用分封制以及宗法制度确立了自己“天下共主”的权威和等级制的国内秩序。然而,到了春秋时期,随着诸侯的勃兴,“各诸侯坐大势强,形成头轻脚重之势”^①。王室的地位被削弱,出现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到战国时期,王室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天子已形同虚设,根本无力“号令”诸侯。如果说在春秋时期周天子对诸侯间的征伐与战争还具有一定的威慑力,诸侯在征伐时还得顾及天子的权威,还得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那么到了战国时期,诸侯在进行征伐时,则根本不顾及周室或打着“勤王”的旗号。诸侯已成为一个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不从属于任何政治权威。它们为维护自身的生存或扩大本国的权力而不断进行征伐,战争的目的甚至也不再是做“诸侯之长”——霸主^②,而是为了兼并、消灭对手。用施韦勒的话来说,它们已不再是“现状国家”,而是意欲推翻旧秩序、建立一个以本国为中心的等级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以周王室为中心的等级秩序已经土崩瓦解。清代学者顾炎武对春秋向战国转变时期的制度巨变作了形象的描绘:

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言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七国则不闻矣;

^① 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② 需要指出的,中国春秋时期的“霸”与我们现在通常意义上所说的“霸权”存在一定差异。前者主要指在接受周天子的等级秩序的前提下或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来“号令诸侯”的行为,争霸的目的为了成为“诸侯之长”,后者则是对于整个体系或其他国家的领导或支配状态,它不承认有更高一级的权威。本文提到的“霸”或“霸权”,如无特别说明,均指后一层含义。

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①

沃尔兹预言，在无政府结构下，由于巨大的竞争压力，国家会不断地模仿他国成功的行为，使本国被“社会化”。这一情形在战国初期的诸侯竞争中得到完整的体现。经过春秋以来数百年的此消彼长和战争，到战国初年时，逐渐形成秦、魏、楚、齐、赵、燕、韩七大国并立的局面，即史称的战国“七雄”。在这七个大国中，楚国的面积最大，秦、赵次之，齐、魏、燕又次之，韩最小。七大国不仅通过不断地攻城掠地、兼并小国，拓展版图来牢固确立自己作为大国甚或霸主地位，还纷纷着手进行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方面的改革，兴利除弊，富国强兵，借以巩固自身的政权和统治，以便在日后的战争及霸权争夺中居于有利地位，如魏国的李悝变法，赵国的公仲连改革，楚国的吴起变法，韩国的申不害改革，齐国的邹忌改革，秦国的商鞅变法等等，一时间变法运动风起云涌，蔚为大观。通过这一系列的变法运动，各国的实力都有不同程度的加强，七雄并立的局面进一步得以确立。七雄并立局面的出现以及周王室的名存实亡表明，战国初期的权力格局是一个典型的多极体系。

（二）魏国的崛起与衰落

战国七雄中，魏国是第一个崛起并“称王”的国家。在七国中，魏国的地理位置并非最优越，相反其地处中央、四面受敌，被称为“四战之地”，地理环境十分不利于向外扩张和霸权图谋。魏国之所以能成为战国初年首先崛起并“称王”的国家，主要得益于它较早在国内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特别是在魏文侯（公元前445—396年）统治时期，率先打破在用人和遴选官员上的“任人唯亲”制度，确立“任人唯贤”的选任标准，并大胆起用法家创始人李悝为相国，进行改革。魏文侯的改革确立了君主集权制的国家政体，开战国风气之先，并大大增强了国家经济以及军事方面的实力，魏国权力开始急剧上升。

随着国力的急速上升，魏国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对外征伐，积极谋取霸主地

^①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转引自杨华：《先秦礼乐文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29页。

位。在魏国刚崛起后的对外征伐中,由于实力尚弱,常常联合同姓诸侯韩、赵两国^①一同对外作战,而非单打独斗。然而,随着魏国实力的不断增强,原先与之一同征战的韩、赵两国开始心存忧虑,再加上对外战争中的分赃不均,如魏国夺取的土地最多,而赵国相对少得多,这些终于导致两国分道扬镳。与此同时,魏国实力的上升也引起了齐、秦、楚等大国的警觉,并由此引发了两场大战: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

1. 桂陵之战

首先爆发的是公元前353年的桂陵大战。在三晋共同对外征伐中,赵国获得的土地相对较少,便多次将矛头指向魏国的属国卫国,魏、赵矛盾激化。^②公元前354年,赵再次攻打卫国,并迫使卫国朝贡。魏国大怒,挥师反击,魏名将庞涓率魏军包围了赵国首都邯郸,赵国危在旦夕,向齐、楚两国求救。

此时的形势对于齐、楚两国来说,都十分明朗。若魏一举歼灭赵国,则魏国的实力将大大加强,整个中原地区将置于魏国的控制之下,这无论对齐、对楚都是极为不利的。更不用说魏国在崛起后曾多次攻占了齐、楚的土地,彼此间的竞争是典型的“零和博弈”。因而,对于齐、楚来说,合理的选择就是援赵抗魏,制衡魏国权力的进一步增长。然而,由于魏国毕竟是强国,且多次打败过齐、楚,贸然制衡的风险较大,因而,在到底如何援赵抗魏以及在何时进行援助上,齐、楚两国各有各的打算。齐国一方面认为必须支援赵国,因为正如齐大臣段干朋所言,“夫魏氏兼邯郸,其于齐何利哉”;另一方面,则主张先不与魏军正面冲撞,待双方精疲力竭时再出击,“夫救邯郸,军于其郊,是赵不拔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郸拔而承魏之弊,是赵破而魏弱也”^③。楚国的想法与齐如出一辙。一方面认为不出兵弊大于利,“今不救赵,赵有亡形,而魏无楚忧,是楚、魏共(意为共同攻打)赵也,害必深矣”;另一方面认为,只要象征性地出动少量兵力坚定赵军抗魏的决心即可,让赵、魏“两弊相罢”,楚国坐收渔利,甚至可因此灭了强敌魏国,“故王不如少出兵,以为赵援。赵恃楚劲,必与魏战。魏怒于赵之劲,而见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释赵。赵、魏相弊,而齐、秦应

① 韩、赵、魏本是晋国的三个卿大夫。公元前455年,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晋国的土地和政权,晋国一分为三,韩、赵、魏各自成为诸侯国。

② 参见《中国军事史·第二卷·兵略(上)》,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98—102页。

③ 刘向集录:《战国策·齐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14页。

楚,则魏可破也”^①。

由于齐、楚两国都不急于出兵,欲让赵、魏先两败俱伤,公元前353年,赵国首都邯郸终于被魏军攻陷。此时,齐国认为时机已到,遂命田忌为大将,孙臆为军师,援赵攻魏。与此同时,楚国军队也在魏攻下邯郸后命大将景舍率军攻魏。魏国在齐、楚两面夹击下,特别是齐国围攻其首都大梁的情形下,急忙回师救援。途经桂陵时,遭齐军埋伏,魏军大败。在魏国两面受敌、与赵齐楚三国打得难解难分而无暇西顾之时,秦国乘机袭击魏国,取得了元里战役的胜利,并夺取了魏的少梁。^② 经桂陵一战,魏国实力受重创。

2. 马陵之战

魏国虽受重创,但并未一蹶不振,也没有收敛其霸权野心。公元前352年,魏联合韩国军队打败了进攻襄陵的齐军,齐被迫向魏求和。次年,魏为了集中力量对付秦国,便把邯郸归还赵国,与赵国在漳水结盟,从而结束了东线的战事。在与齐、赵两国先后讲和后,魏国便挥师西进,全力图谋秦国。魏不仅收复了桂陵战争期间及其后被秦国攻占的土地,还围攻了秦的定阳,秦国为之震动。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到彤与魏惠王相会,与魏暂时“修好”,魏又一度取得了霸主地位。公元前344年,魏惠王自称为王,“广公宫,制丹衣,旌建九旂,从七星之旗”^③,俨然摆出天子的场面。不久,魏惠王又迫使宋、卫、邹、鲁等小国国君并邀请秦公子少官参加逢泽之会,魏国势力盛极一时。

公元前342年,魏因韩国抵制逢泽之会而大举出兵,向自己先前的盟友韩国发动进攻。韩支撑不住,遂向齐国求救,齐、魏间遂爆发了第二次大战,即马陵之战。韩国向齐国求救后,齐国对韩国的态度与先前对赵国的态度如出一辙,主张让韩、魏先两败俱伤,待魏兵疲弱时再出锐师击魏。“夫韩、魏之兵未弊,而我救之,我代韩而受魏之兵,顾反听命于韩也。且夫魏有破韩之志,韩见且亡,必东诉于齐。我因阴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则国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④

由于力量悬殊,韩国五战皆败。公元前341年,韩再度向齐求救。齐国看

① 刘向集录:《战国策·楚一》,第483—484页。

② 慕中岳、武国卿:《中国战争史》,北京,金城出版社1992年版,第276页。

③ 刘向集录:《战国策·齐五》,第442页。

④ 刘向集录:《战国策·齐一》,第316页。

到魏、韩已“弱者死，壮者伤”，正是“受重利而得尊名，用小力而成大功”的有利时机，遂命田忌、田婴为将，孙臆为军师，出兵援韩。在军师孙臆的卓越指挥下，战斗取得了辉煌胜利，十万魏军全部被歼，魏国精锐尽失，遭到严重削弱。在魏国大败于马陵后，赵国、秦国趁机追随齐国，也加入了瓜分魏国的行列，魏腹背受敌，不断丢城失地。公元前340年，魏国又遭秦国重创，公子卬被俘，魏国在内外交困、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一方面被迫与齐国交好，另一方面割地事秦，缓解秦国的进攻压力。此后魏国一蹶不振，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落。

从魏国由盛而衰的两次重要战役桂陵和马陵之战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在面对魏国的霸权威胁时，赵国以及魏国的周边大国秦、齐及楚国都不愿意尾随魏国或接受魏国的霸权秩序，它们表现出制衡魏国霸权的强烈倾向。这表明，在权力落差不大的情况下，大国更愿意制衡对方的霸权企图。第二，从赵、韩因魏国的进攻而向齐、楚求援后，齐、楚两国各自的反应中可以看出，虽然齐、楚两国不愿魏国实力因灭赵或灭韩而进一步增强，都主张制衡魏国，却不愿承担因制衡而可能伴随的巨大成本，希望让冲突双方先血流成河，待它们都精疲力竭时，再出兵相救，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收益。这表明，即便在制衡时，国家也具有“推卸责任”的强烈动机，不愿过早地介入冲突。第三，在齐国因援赵、韩而与魏国交战的两次大战中，西部大国秦国都先选择了不介入的政策，待战局明朗后再加入其间，最大限度地为本国牟利，楚国的行为亦大同小异。这表明，在面临冲突时，即使是体系中的大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具有等待观望、不介入冲突的强烈动机。第四，从这两次大战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在面临霸权威胁以及由此而引发的霸权冲突中，面临霸权威胁的国家因地理位置的远近或权力地位的不同，或选择制衡，或倾向于奉行不介入，甚或选择追随政策，而并非只有制衡这一种选择，也并非只是在制衡或追随这两者间做出抉择。

（三）秦国的崛起与合纵、连横运动

1. 秦国的崛起

秦国地处西陲，长期与戎狄杂居，直到战国初年，秦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还十分落后，并被六国视为“异类”，“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

夷翟遇之”^①。经过秦献公、秦孝公两代国君的励精图治、改革进取,国力开始蒸蒸日上。特别是秦孝公(公元前361—338年)即位后,大胆任用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积极推行变法运动(如鼓励垦荒耕织的“垦草令”;在全国推行县制;奖励军功,按军功晋升爵位;实行严刑峻法等等),使秦国国力急剧上升。在战国初期的两次诸侯大战——桂陵、马陵之战中,秦国巧妙地利用魏国与齐、赵、韩等大国交锋无暇西顾时,乘机袭击魏国的后方,收复了大片失地。在马陵之战后,又利用魏国实力锐减,并再遭齐、赵攻击的时机,出兵魏国,迫使魏国先后献出了整个河西地区,占据了黄河天险。自从秦国占有了整个河西地区,秦国与魏国的力量对比就发生了巨变,秦国“从此,在军事实力方面超过了魏国,改变了劣势的地位”^②。

秦惠文王(公元前337—311年)即位后,继续推行商鞅的做法,且举贤任能,“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随着秦国国力继续上升,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继魏、齐之后自称为王,并开始将目光投向中原,积极谋取霸权。

秦国谋取中原霸权的野心在秦孝公后期即已显露出来。公元前340年,商鞅曾对秦孝公说,“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因而主张先削弱魏国,迫使魏国不断东迁,让秦据黄河之险,开山东诸国之门户,以成帝业。秦“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③,后来,秦国不断进攻魏国西边土地,并迫使其献出河西之地,正是沿着商鞅的战略路线前进。

秦国不断割取魏国的土地,特别是秦惠文王称王的举动,充分暴露了秦国的霸权野心,引起了中原诸国的警觉和关注,合纵抗秦之议遂起。而秦国为了瓦解和分化诸侯的联合制衡之举,在秦相张仪的谋划下,积极推行连横政策。战国遂进入了战争频仍、联盟诡谲多变的历史时期。

2. 合纵与连横运动的缘起

西方秦国的崛起对中原诸国来说,意味着双重挑战。第一,地缘政治上的挑战。与魏国崛起时颇为不同的是,秦国的人口和面积远大于魏国(特别是在魏被迫献出河西七百里地后^④),是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且与四面受困的魏

① 司马迁:《史记·秦本纪》,北京,台海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② 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6页。

③ 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第632页。

④ 《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西表地于秦七百里。”

国不同,秦位于西部,只有一面(即东面)与楚(东南部与楚相邻)及韩、魏等中原国家接壤,其余皆与弱小的戎狄、巴蜀等落后小国或部落相接,不能对秦形成真正的威胁。这样,秦国一旦向东扩张,并无腹背受敌之虞;而且,在秦占有黄河天险后,中原的西部门户已洞开,无险可守,秦挥师东进将如探囊取物;再者,与秦毗邻的东部国家魏、韩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大国,特别在魏国霸权衰落后,魏、韩两国根本无法有效地遏制秦国的东进势头,因而,秦国的崛起对其他国家来说是真正的地缘政治挑战。第二,文化上的挑战。除南方的楚国外,其他国家原先都是周王室分封的诸侯,是礼乐文化的正宗传人。而秦国不但受中原礼乐文化的影响较少,还部分因袭了戎翟这些落后部族的习俗和文化,为中原国家所不齿。这样,秦国的崛起以及对中原的覬觐,在诸侯国看来,就不仅是实力上的挑战,更是文化认同上的挑战。在《战国策》中,中原国家,甚至是在春秋初期一度以“蛮夷”自居的南方大国楚国,每每谈及秦国的威胁时,总不忘提及秦国与它们在文化或身份上的差异,如说客苏秦在劝楚王合纵抗秦时曾说:“夫秦,虎狼之国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横人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谓养仇而奉讎者也。”^①显然,在苏秦眼里,秦国就是一个与禽兽等同、不通礼义、贪得无厌的异类国家。楚王在谈到秦国时,也指出:“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②魏公子信陵君在劝魏王不要与秦国一起攻打韩国时,也说:“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积德也。”^③虽然并不能排除这些人对秦国的描述带有偏见的成分,甚至言过其实,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从内心深处视秦国为不同于自身的异类,视秦国的挑战为真正的对中原礼乐文化的挑战,虽然礼乐文化在中原本身早已崩坏了。

正是在面临秦国这种双重挑战下,合纵之说遂起。所谓合纵,根据史料,主要包含两层含义:第一,从地理的角度看,秦在西部,韩、赵、魏三国在中心,燕在北,楚在南,齐在东。这样以韩、赵、魏三晋为中心,北连燕、南连楚,则为纵,所谓“南北为纵”、“合关(指函谷关)东之为纵”^④,即为此意。第二,从联盟角度

① 刘向集录:《战国策·楚一》,第503页。

② 同上。

③ 刘向集录:《战国策·魏三》,第869页。

④ 刘向集录:《战国策·秦一》,第78—79页。

来看,合纵主要是指韩、赵、魏以及燕、楚等实力相对较弱的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强大的秦国(以及在较小程度上针对齐国)的联盟行为,所谓“合众弱以攻一强”^①。此含义与本文所界定的制衡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指联合弱者以应对强国的霸权威胁。

地形与秦国犬牙交错、屡遭秦国侵袭的魏国开始认识到,要应对强秦的挑战,维护自身的安全与生存,就必须联合韩、赵等国,共同抗击秦国的侵略。因而魏国开始重新与韩、赵两国修好,积极开展合纵外交活动。公元前325年,魏惠王在巫沙与韩威侯(公元前332—312年)会晤,尊称后者为王(即韩宣惠王)。同年,韩宣惠王回访魏王,双方还一同携带太子至赵,朝见刚即位的赵侯(即赵武灵王)。三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彼此攻伐、相互削弱后,又重新走向了联合。此外,魏国还积极谋求与齐国修好,多次与齐威王会晤。公元前323年,由秦至魏并出任魏将的公孙衍发起“五国相王”^②,通过承认燕、赵、中山三国为王以联合三晋及燕、中山国共同对付秦国。

在合纵运动发端的同时,秦相张仪也针锋相对地展开了连横外交活动。与合纵相对应,“连横”也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从地理角度看,连横是指地处西端的秦国与其东边的任何一国或几国联合对外的政策或行动,所谓“东西为横”、“连关中之为横”^③。第二,从联盟角度看,连横是指强大的秦国拉拢、联合六国之一或几个来分化、打击其余的政策及行为,或者说六国中的一国或几国在秦的拉拢、诱惑下,追随秦国以攻击其他国家的政策或行为,所谓“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④。不难看出,在此意义上,连横与我们所界定的追随有很大的相似性。

张仪连横的主要目的就是破坏、瓦解合纵运动,以便秦国各个击破,最终确立秦国的霸权。公元前323年,秦相张仪与齐、楚大臣相会,孤立魏国,破坏魏国的合纵外交;同年,楚国出兵魏国,攻取了魏国的八个城邑;公元前322年,秦出兵攻占了魏的曲沃、平周;公元前319年,秦又出兵攻打韩国,攻取了韩的鄢。

① 《韩非子·五蠹》。

② 刘向集录:《战国策·中山策》,第1170—1174页。

③ 刘向集录:《战国策·秦一》,第79页。

④ 《韩非子·五蠹》。

魏惠王在秦国的步步进逼下,甚至一度请张仪为相,准备西面事秦^①,张仪的连横外交初见成效。

秦国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以及张仪“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的昭彰意图,引起了各国,特别是三晋的严重不安。^② 公元前319年,魏惠王死后,子襄王(公元前318—296年)继位,齐、楚、燕、赵、韩等五国出面支持主张合纵抗秦的公孙衍为魏相,并将张仪逐回秦国。公元前318年,在魏相公孙衍的主持下,魏、韩、赵、燕、楚组织了第一次合纵攻秦运动,并推举楚怀王为纵长,然而,这场外交上轰轰烈烈的合纵抗秦运动并没有取得多大实际效果。楚国虽为纵长,但并没有真正出兵。北方的燕国也没有派兵攻打秦国。实际与秦作战的只有魏、韩、赵三国。由于五国并不能精诚合作,结果兵至函谷关就被秦军击退。次年,秦在修鱼大败韩军,斩首八万,喧嚣一时的“五国伐秦”以失败而告终。

3. 连横、合纵斗争与楚、齐的衰落

五国合纵攻秦的失败以及秦国在修鱼一战取得的重大胜利,使秦国与三晋间的实力对比进一步发生倾斜。而五国合纵的失败,也让秦国清楚地看到合纵内部固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秦惠王有言:“诸侯不可一,犹连鸡之不能俱止于栖之明矣。”^③张仪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夫亲昆弟,同父母,尚有争钱财。而欲恃诈伪反覆苏秦之余谋,其不可以成亦明矣。”^④张仪的分析典型地反映了在“霍布斯式无政府文化下”,合纵抗秦面临严重的“囚徒困境”问题,即便是亲兄弟都会出现争钱财的事,更何况六国各怀野心、彼此狐疑呢?

正是出于这种分析,秦国并没有停止东进的战略意图。为稳固秦国的侧翼安全,公元前316年,秦趁位于秦国南端的“戎狄之长”的巴蜀国发生内乱,攻取了巴蜀,国土面积增加一倍以上^⑤,而且,由于巴蜀与南方大国楚国相邻,且位于楚国上游,顺江而下,可直捣楚国,“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⑥。秦

① 林剑鸣著:《秦史稿》,第239页。

② 司马迁:《史记·张仪列传》,第644—645页。

③ 刘向集录:《战国策·秦一》,第92页。

④ 司马迁:《史记·张仪列传》,第644页,另见刘向集录:《战国策·魏一》,第793页。

⑤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19—520页。

⑥ 常璩:《华阳国志》。

国的实力及战略地位得到大大加强。

然而,面对实力已剧增、东进意图彰显的秦国,山东(指崤山函谷关以东)六国囿于眼前私利,非但未能合作抗秦,反而相互攻伐、彼此削弱。公元前314年,东方大国齐国趁燕国内乱,大举破燕,燕王哙身死,后来燕虽赶走了齐军,但实力已大大削弱。而一度灭国的中山国也在齐国攻燕时趁火打劫,大败燕军,“辟启封疆,方数百里,列城数十”^①。齐、燕、中山间的战争,给秦国东进以可乘之机。就在齐伐燕的同年,秦攻取了魏国的焦和曲沃,并在岸门大败韩军。在秦国的不断打击下,孤立无援的韩、魏被迫先后追随秦国,与秦结盟。^②

在吞并了巴蜀,臣服了韩、魏后,六国中还能与秦国抗衡的只有东方的大国齐国以及南方的大国楚国。齐国在大败燕国后,实力大振,且齐国曾助楚国攻占了被秦兼并的曲沃,因而秦惠王意欲攻打齐国。^③但问题是,齐、楚两国早在五国伐秦时已结为与国^④,且秦与齐国相隔遥远,一旦秦劳师远袭齐国,而齐的与国楚国在侧面发动袭击,秦将腹背受敌。因此,秦国决定对楚国进行连横活动,拆散齐、楚联盟。

在秦相张仪以割地六百里与楚的利诱下,楚怀王(公元前328—299年)放弃了与齐国的联盟。在成功拆散齐楚联盟后,秦国利用楚国的孤立局面,进攻并大败楚国,夺取了楚国方圆六百里的汉中地区,使秦国的本土与巴蜀连成一片,奠定了秦国东进战略坚实的物质基础。

楚国削弱后,只有齐国还有实力与秦相抗衡。实际上,在秦国离间了齐楚联盟、不断削弱楚国的同时,齐国联合屡遭秦国侵略的魏、韩两国先后发动了对楚和对秦的战争。三国不仅于公元前301年重创楚国,而且于公元前298—296年大举进攻秦国,一举攻破了函谷关,迫使秦国求和。秦国被迫归还了先前攻取的魏、韩的一些地区。这说明,虽然秦国实力强大,但只要山东诸国并力抗秦,还是能够较为有效地遏制秦国的霸权图谋。但问题是,山东诸国并不能精诚合作,常常为了眼前的一点点利益而兵戎相见、彼此削弱,甚至不惜追随秦国。

① 杨宽:《战国史》,第328页。

② 司马迁:《史记·魏世家》,第534页;司马迁:《史记·韩世家》,第539—540页。

③ 刘向集录:《战国策·秦二》,第133页。

④ 裴默农:《春秋战国外交群星》,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501页。

为贯彻东进战略,继续蚕食齐、秦之间广阔的“中间地带”,并破坏齐、韩、魏间的联盟,秦国开始与齐接近。而此时,齐国因内部权力斗争而免去了主张抗秦的孟尝君,改任秦国人五大夫吕礼为相。^①同时,齐湣王(公元前300—284年)因垂涎与其比邻的中原富庶小国宋国,也愿意缓和与秦国的关系。公元前295年,齐、秦捐弃前嫌,重归于好。在成功拆散齐、韩、魏联盟后,秦国大举进攻实力相对弱小的韩、魏。公元前294年,秦在伊阙大败韩魏联军,斩首二十四万^②,魏、韩再次遭受重创。公元前292—289年,秦不断攻打韩、魏,势如破竹。公元前290年,魏被迫将河东地四百里献于秦,韩则将武遂地二百里割让秦国。^③秦国连横战略取得巨大成效。

秦国连横战略的成功,一方面进一步刺激了秦国称霸中原的胃口,另一方面则使韩、魏等国“食不甘味、寝不安枕”。公元前288年,秦昭王(公元前306—251年)不满足于“王”的称号,在宜阳称“帝”。同时,派相国魏冉到齐,尊称齐湣王(公元前300—284年)为东帝,并相约共同讨伐实力大增的赵国。秦国称帝之举进一步暴露了秦国“吞并天下”的野心,而齐、秦两强结欢的举措更是让处于两强之间的三晋及燕国寝食难安。合纵之说又死灰复燃。此时,韩、魏两国已虚弱不堪,根本无力再次组织抗秦。燕国在燕昭王(公元前311—279年)的卧薪尝胆下,国力逐渐恢复,但仍无力左右局势,况且燕国仍对齐国当年灭燕耿耿于怀,伺机复仇。^④赵国在赵武灵王即位期间(公元前325—299年)大力进行改革,实行“胡服骑射”,国力大振。后赵国利用秦国与齐、韩、魏大战的间隙,于公元前300—296年灭掉位于其东部的中等强国中山,并攻取了西北部的胡人地区,国土面积扩大了一倍以上,实力大大增强,成为战国中后期遏制秦国东进的一道屏障。^⑤这样,赵国便成了组织合纵运动的最佳人选。赵国的当权人物李兑开始联络受秦威胁的韩、魏等国,组织抗秦运动。

与此同时,著名说客苏秦自燕至齐,力劝齐湣王放弃称帝,与燕国、三晋合

① 司马迁:《史记·孟尝君列传》,第663—664页。

② 司马迁:《史记·秦本纪》,第32页。

③ 司马迁:《史记·魏世家》,第534页;司马迁:《史记·韩世家》,第540页。

④ 司马迁:《史记·燕召公世家》,第459—460页。

⑤ 高锐:《中国上古军事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15页。

纵抗秦。在苏秦的游说下,齐国改变了与秦并立为帝、“约伐赵”的立场,废除帝号,并命苏秦奔走于韩、魏、赵等国之间,合纵抗秦。

公元前 287 年,齐、韩、赵、魏、燕五国第二次合纵抗秦正式形成。然而,在这一成员相对较多的联盟中,成员国更关心的是一己私利而非公共利益。齐国参与抗秦的真正目的是想趁机灭掉宋国,削弱秦国反而是次要目的。而燕国的真正目的是离间齐国与三晋以及秦国的关系,并以宋国为诱饵,使齐国成为众矢之的,以报当年齐破燕之仇。即使是抗秦意志较为坚定的赵国,其国内也并非铁板一块,还有相当的联秦抗齐势力,甚至是力主抗秦的李兑也一度“阴构于秦,又欲与秦攻魏,以解怨”^①。韩、魏虽有心抗秦,但实力太弱,无足轻重。由于各国皆从一己私利而非集体利益出发来指导自己的行为,这反过来又加重了联盟内的不信任感。战国以来,联盟具有高度的流动性,昨日的盟友往往就是今日的仇敌;而且,各国都怀有兼并之心(或者说都是修正主义国家),互不信任,背信弃义的现象比比皆是,这就有效地限制了各国间的合作。各国都恰似一个囚徒,担心本国在为联盟“出力”时,他国会坐享其成、搭免费车,甚至会背叛盟友,与敌方结盟。

正是由于各国貌合神离,且彼此间充满猜疑,因而五国军队进发到荥阳、成皋后,就不再前进,并没有与秦爆发真正的大战。即便如此,在五国联军的威慑下,秦国不但废除了帝号,而且将先前从魏、赵夺取的部分土地归还两国。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若五国合力抗秦,依然能够挫败秦国的霸权图谋,确保各自的生存。

在五国合纵抗秦的第二年,齐国挟抗秦之余威,开始大举进攻宋国,并将宋一举灭亡。此外,齐国还“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欲以并周室,为天子。泗上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诸侯恐惧”^②,齐国四面树敌、左征右伐的举动激起了各国的普遍不满和恐惧。中原各国现在又开始担心齐国的霸权企图了。燕国对齐国当年的行为仍耿耿于怀,趁此时齐国四面树敌之际,积极联络赵、魏、楚等国,共谋伐齐;由于三晋与宋相近,唇亡齿寒,宋亡对三晋威胁极大;况且赵国

① 刘向集录:《战国策·赵四》,第 727 页。

② 司马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第 547 页。

的李兑也曾垂涎宋国富庶的商业重镇定陶,并曾与魏国一起攻打过宋国^①,因而魏、赵积极响应燕的伐齐之举。山东六国的“内耗”正符合秦国各个击破的战略,于是秦便以盟主的身份出面,组织合纵攻齐运动。^②这样,联盟形势发生急转,由五国合纵攻秦摇身一变成为五国合纵攻齐。

公元前284年,秦、韩、赵、魏、燕五国在完成了一系列外交准备后,组织了五国联军,共同伐齐。齐国大败,差点灭国,从此一蹶不振。至此,秦国的东进战略取得重大突破,横卧在秦东进道路上的两大强国楚、齐都先后被秦成功削弱,无力与秦一争高下。而居于枢纽地位的韩、魏因与秦临近而不断遭到秦的削弱,国土面积大大缩水,它们不仅不能成为遏制秦国东进的屏障,相反成为秦国东进的跳板和蚕食的对象。

在这次合纵攻齐战争中,秦国不仅成功利用五国的内部矛盾化险为夷,将强敌齐国击溃,而且趁机夺取了垂涎已久的宋国的定陶。齐衰弱后,秦又将矛头对准了三晋与楚。秦灭六国的战争也由此渐渐拉开了序幕。

(四) 单极的出现与秦灭六国

1. 单极下的国家行为

齐国削弱后,出现了六国皆弱唯秦独强的权力格局。秦国通过经年累月的征伐,攻占了大片的土地,不仅对与其毗邻的魏、韩、楚形成巨大的威胁,而且将势力延伸到六国的腹地(位于齐与三晋之间的宋国的定陶此时已为秦国所有)。魏、韩在秦国的不断攻打下,国土面积急剧减少,已成弹丸之地,灭亡指日可待。楚国连续遭受秦国的打击,已一蹶不振,再也不会出现纵横家们所津津乐道的“横成则秦帝,从(纵)成则楚王”^③的局面了。齐国已遭重创,无足轻重,燕国本就是弱国,虽曾一度破齐,但国力并未有大的提高。只有赵国,经过赵武灵王的改革,特别是吞并中山后,国力大振,成为燕破齐后抗衡秦国东进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即便如此,与秦国相比,赵国无论在土地面积、人口规模还是在军事力量上,都远在秦国之下。换言之,此时的体系

① 杨宽:《战国史》,第340—341页。

② 林剑鸣:《秦史稿》,第254—255页。

③ 刘向集录:《战国策·秦四》,第239页。

已差不多进入“单极”时期。在这种权力分布严重失衡、近乎单极的格局下，要对抗秦国的霸权图谋，仅凭一国之力是远远做不到的，必须依赖于各国的精诚合作。

然而，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国”文化结构下，合作又谈何容易。各国都有兼并之心，也时时刻刻担心被对方兼并，毋宁说合作，即便共处亦无法做到。国家间缺乏起码的信任，处于典型的囚徒困境状态。因而，尽管从理性角度来看，面临秦国的严重威胁，合纵抗秦是各国确保自身安全的唯一途径。但是一如既往，六国间并未能合力抗秦。相反，各国或迫于秦国的威胁、利诱而追随秦国，或惑于眼前的些许利益而彼此攻伐，或昧于大势而偏安一隅无所作为，即便其中的一些国家迫于生存压力暂时联合起来，但旋即又陷入彼此攻伐的局面。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秦国对六国的攻伐则不绝如缕、一如既往，并在需要时，继续采用连横策略对六国进行分化瓦解、分割蚕食。

齐国削弱后，秦国开始全面推进东进战略。在南面，从公元前 280 年起，秦国连续五年攻打楚国，攻占了楚国国都郢，重创楚军主力，夺取了楚国的大片土地，迫使楚迁都于陈。经过秦国的连续打击，楚国已虚弱不堪，再也不能对秦国的侧翼形成威胁；在东面，秦国则继续围剿三晋，蚕食对方。公元前 283 年，当燕、赵两国还在继续攻打齐国时，秦国即已挥主力东进，攻打魏国，直逼魏国国都大梁。公元前 282—281 年，秦又连续攻打赵国，夺取了赵国的一些地区。此后，秦国为了专心对付楚国，一度停止了对三晋的进攻，分别与魏、韩、赵三国会盟。待重创楚国后，秦国再次将矛头对准了三晋。自公元前 276 年始，秦开始连续攻打魏国，并两度逼近魏国国都大梁。公元前 273 年，秦大败魏、赵联军，斩首十五万。魏王万般无奈，献南阳于秦，宾服秦国，而韩国在魏之前也臣服秦国。^①

在秦国不断攻取楚、魏土地的过程中，曾发生过两次插曲。它们较为典型地反映了六国在面临强秦威胁下的心理和行为反应，在此值得一提。

第一件事发生在秦国重创楚国，并迫使韩魏宾服之时。当时，秦国准备挟韩、魏一起攻打楚国，恰巧楚国的春申君黄歇在秦国。黄歇担心秦国趁楚国极

^① 司马光：《资治通鉴·周纪四》，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5 页。

度衰弱之际而一举灭楚,遂上书秦昭王(公元前306—251年),力劝秦国不要伐楚。他说,韩、魏是秦国的邻国,又是合纵抗秦的枢纽之地。且秦国与韩、魏有“累世之怨”,“夫韩、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将十世矣”,而楚国则是秦国的援国。今秦国不去攻打自己的仇敌,反而与之攻打自己的援国,不仅是大错特错,甚至将有“社稷之危”。而且,如果秦攻楚,魏国将趁机攻取宋,“宋必尽”,齐将占领泗水地区,此所谓“王破楚以肥韩、魏于中国,而劲齐”。要避免出现此一局面,秦国最好是与楚亲善,“秦、楚合而为一”攻打韩、魏、齐,则韩、魏唾手可得,齐国的“右壤可拱手而取也”。如此,则燕、赵、楚、齐四国“不待痛而服矣”^①。秦昭王为黄歇之言所惑,遂放弃了攻楚行动,与楚国“约为与国”,楚国遂逃过一劫。

楚国虽因黄歇之言而暂时逃脱厄运,但黄歇对秦昭王的谏言中则清晰地表明,六国在面临强秦威胁时,首先想到的并不是如何加强六国间的团结与协调,共同对付秦国。相反,都是从一己私利出发,寄希望于祸水他引,以此逃避风险,甚至不惜追随秦国,与之一起征伐、削弱他国。这种行为的后果是不言自明的,它不仅会加剧秦国与六国间的权力失衡,更加剧了六国间的猜忌和“离心离德”,最终导致六国的灭亡。

第二件事则发生在公元前273年秦大败魏、赵联军之后。魏国在屡遭败绩后,迫于秦国的压力,准备割南阳以事秦。魏人孙臣反对割地事秦,指出:“以地事秦,譬犹抱薪而救火也。薪不尽,则火不止。”^②显然,正如孙臣所指出的,在面临强秦威胁时,如果一味妥协推让,甚至追随秦国,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地尽人亡、万劫不复。然而,魏王最终还是没有听从孙臣的谏言,而是割南阳市秦。魏王的举动表明,在权力极其悬殊的背景下,一些国家为了能暂时缓解眼前的安全危局,不惜以牺牲长远利益为代价,实际上国家并不能在眼前压力与长远利益之间做出合理的选择。这两例也说明了在权力分布严重失衡的单极体系下,追随是一种极为普遍的行为倾向。

2. 长平之战与秦灭六国

在六国皆弱、秦国独大的权力格局下,对于秦国来说,根本问题已不是能否

^① 司马迁:《史记·春申君列传》,第673—674页。

^② 刘向集录:《战国策·魏三》,第863页;另见司马光:《资治通鉴·周纪四》,第25页。

兼并六国,而是何时、以何种方式兼并六国。在著名说客范雎的建议下,秦国决定先攻打与秦毗邻的战略要地韩、魏,去除“腹心之患”,然后再蚕食其余。为营造有利于攻打韩、魏的外部环境,秦国与位于东方的齐国交好,以便“齐附而韩、魏因可虏也”^①。这就是著名的“远交近攻”战略。

自公元前 268 年始(即范雎向秦昭王提出远交近攻建议的当年),秦国开始连续向魏、韩大举进攻,先后攻占了魏国的怀、刑丘,迫使魏国向秦国屈服;攻取了韩国的少曲、高平以及战略要地南阳、野王,将韩国国土拦腰斩断。^②

在秦国的凌厉攻势面前,韩国有如累卵,岌岌可危。公元前 262 年,即秦国攻取野王而将韩国拦腰截断之时,韩桓惠王(公元前 272—239 年)慌忙将战略要地上党献于秦国求和。然而,上党的郡守不愿献地于秦,而是将上党地区献给了赵国,以期造成秦、赵矛盾,然后赵、韩合力抗秦的局面。^③

如前所述,在战国后期,六国中只有赵国的实力稍强。如果六国能够精诚团结在赵国的周围,还是有可能确保自身生存与安全的。遗憾的是,六国未能做到这一点。公元前 261 年起,秦派数路大军进攻赵国。由于秦强赵弱,战斗一开始,赵国即丢失了一些城池,但赵国在老将廉颇的坚守下,有效遏制了秦国的进攻势头,双方在长平相持数月而不决。后来秦使用反间计,在长平地区大败赵军,全歼赵军主力 45 万人之多,这就是著名的长平之战。此役过后,赵国国力遭受严重削弱。

在长平之战前后,各国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和反应颇令人玩味。韩国在秦国的打击下,已如惊弓之鸟,屈服于秦国的压力而割地事秦,并不肯与赵合力攻秦;魏国则贪图小利而昧于大势,在得到秦王将割韩地垣雍于魏的空头许诺后,也倒向了秦国一边,不肯援助赵国^④;与赵国毗邻的燕国,在秦、赵恶战时,也并未对赵施以援手;齐、楚两国曾做出援助赵国的姿态,但并未真正出兵,相反,在赵国主力困于长平,向齐国请求军粮时,齐国不肯答应,见死不救。^⑤当时,曾有说客力谏齐王救赵,指出:“不如听之以退秦兵,不听则秦兵不却,是秦之计

① 司马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另见司马光:《资治通鉴·周纪五》,第 28 页。

② 司马光:《资治通鉴·周纪五》,第 29 页。

③ 司马迁:《史记·赵世家》,第 529 页。

④ 刘向集录:《战国策·魏四》,第 900 页。

⑤ 司马光:《资治通鉴·周纪五》,第 30 页。

中而齐、楚之计过也。且赵之于齐、楚，扞蔽也，犹齿之有唇也，唇亡则齿寒。今日亡赵，明日惠及齐、楚。”^①然而齐王不为所动，拒绝对赵国进行援助。

当此时，秦国为了与赵决战，也是倾全国之兵以赴。秦国极为担心的是，在秦、赵决战时，其他国家会施援手于赵。当时的形势处于这样的微妙阶段——“天下合于秦，则无赵；合于赵，则无秦”^②。秦国曾计划，如果楚、齐倾力救赵，“则将退兵”；如果楚、齐并非真心救赵，则大举进攻赵。^③ 秦国许诺魏国垣雍的目的也正是出于拉拢魏国、破坏合纵的考虑。然而，其他各国并没有利用秦倾主力与赵大战于长平的有利时机，联合各国共同打击秦国，甚至一举将秦击溃，反而在秦国的威逼利诱下，囿于一己私利，或向秦示好、追随秦国，或隔岸观火、不介入冲突，或虽做出支持赵国的姿态，但却“口惠而实不至”，不肯真正出兵抗秦。

经长平之战，赵国国力大衰。此后，赵国虽曾在邯郸之战中挫败秦国，但已根本无法扭转整个局势的发展了。

秦国重创实力较强的赵国后，秦与六国的力量对比进一步发生严重倾斜，吞并六国已水到渠成。

重创赵国后，韩、魏更加孤立无援。秦国消灭韩、魏的时机已成熟。从公元前 256 年开始，秦国不断地进攻韩、魏，攻取了大片土地。其间，秦还分别于公元前 256、249 年消灭了国土为韩国环包的西周和东周，周室从此灭亡。^④

在秦国的步步进逼下，三晋已疲于奔命，特别是韩、魏，其土地面积已捉襟见肘，灭亡指日可待。在灭亡威胁已迫在眉睫的情况下，韩、赵、魏、楚、燕五国在魏人信陵君无忌的积极联络下，于公元前 247 年发动了又一次合纵攻秦运动。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此时秦国实力早已是一枝独秀，但由于五国间的精诚合作，仍然击败了秦军，并将秦军追至函谷关而还。^⑤ 然而，这一次的合纵攻秦胜利并没有给秦造成重创，也未能改变秦与六国间的权力对比，而且，即便在五国合作抗秦时，地处东边、曾一度强大的齐国也并没有参与合纵行动，而是“事秦谨”，偏安一隅。尤为可悲的是，五国的合纵行动在取得点滴胜利后即土崩

① 司马光：《资治通鉴·周纪五》，第 30 页；另见司马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第 547 页。

② 刘向集录：《战国策·魏四》，第 900 页。

③ 刘向集录：《战国策·齐二》，第 360 页。

④ 司马光：《资治通鉴·秦纪一》，第 35—36 页。

⑤ 同上书，第 36 页。

瓦解,魏、赵、燕等国又陷入彼此间的攻伐之中。

秦国在五国败秦后,并没有收敛东进态势,反而加大了打击三晋的力度。公元前246年,秦再次全部夺取了韩国的战略要地上党郡,两年后又攻取韩国十三座城。同时趁燕、赵交兵之际,攻占了魏的酸枣等二十城,设立东郡^①。至此,秦国的国土已与齐国相连,隔断了南方的楚国与北方的燕、赵的联系,韩、魏两国已成“瓮中之鳖”,“合纵之脊”已被一刀两断,六国处于秦国的分割包围之中。

在“山东之腰”已被切断、六国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公元前241年,楚、韩、赵、魏、燕五国组织了最后一次合纵运动,南方的楚国被推举为纵长。五国联军在赵将庞煖的统率下,向秦国的蕞地进攻,但此时五国已虚弱不堪,待秦兵反击后,即向后撤退。赵军在撤退过程中,将矛头指向并没有参加合纵行动的齐国,攻取了部分土地^②,最后一次合纵攻秦失败,表明在强大的秦国的进攻面前,五国已经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秦灭六国已成定局。

最后一次合纵攻秦失败后,秦大举进攻三晋。韩、魏在无外部援助又陷于秦国的包围打击下,割地事秦,追随秦国,魏国甚至一度与秦攻打楚国,而赵国则将矛头多次指向燕国。秦国则趁燕、赵相互攻伐时,大举伐赵,夺取赵的大片土地。在秦国的不断攻伐下,六国面积日益缩小,从公元前230年秦首先灭韩开始,到公元前221年齐国最后灭亡止,秦国仅用了短短十年的时间,陆续灭亡了六国,统一了中国。

四、结 论

沃尔兹的均势理论认为,只要结构处于无政府状态,均势就会“一再出现”,国家将会“制衡而非追随”。然而,从前述诸多学者的论述以及本文的研究表明,均势的出现并非必然,制衡也非国家在面临霸权威胁时的唯一或主导战略反应。

正如本文的研究显示,在无政府文化结构、体系的极、国家间的权力对比、

^①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第34页。

^② 关于这次五国合纵攻秦行动,《史记》、《资治通鉴》上的记载多有混乱,对于合纵的国家、攻打秦国的地点等都有不一致的地方。本文依据著名战国史学者杨宽的考证,参见杨宽:《战国史》,第366页。

地理位置以及观念这五组变量的共同作用下,具体情境中的国家行为大大“偏离”了均势理论的预期,产生了大量的非制衡行为,甚至导致体系权力的高度集中。如上述案例表明,在战国时期这种“力争取胜、胜者为右”的文化结构下,国家间根本无法建立起有效的合作,面临严重的囚徒困境。在权力高度失衡的情况下(如单极),国家在反霸合作上的囚徒困境将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它便于霸权觊觎者进行威逼利诱、各个击破。秦国正是利用合纵战略的内在困境而针锋相对地抛出连横战略,并最终取得成功。国家权力对比上的差异,导致弱国、小国在面对大国的威胁时,若无外部坚强援助,往往会屈服于大国的压力,追随后者。战国后期的韩、魏就时常如此。而国家与威胁源的远近,也会极大地影响其对外行为。韩、赵、魏由开始时的结盟对外,到各自羽翼丰满后的彼此攻伐,秦国的“远交近攻”战略,都充分体现了地理位置对国家对外行为的影响。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而产生的对威胁的不同认知和反应,以及六国对秦国的极大反感,都反映了观念对国家行为的影响。

正是在上述变量的共同作用下,我们看到在面对霸权威胁时,制衡并未成为体系内的主导战略,不介入乃至追随反而成了更为常见的战略,而后者又加剧了体系权力的集中趋势,最终导致秦帝国的建立。

限于篇幅的缘故,本文的实证部分仅考察了战国时期这一典型的“霍布斯式文化结构”下的国家对外战略行为,而没有探究诸如“洛克式无政府文化结构”下的国家对外战略行为。如前所述,在后一种文化结构下,由于反霸国家间不存在“你死我活”的斗争,相对而言合作的阻力要小一些,但合作将依然受到“集体行动的难题”及其他上述变量的限定。如拿破仑战争时期,欧洲国家在面对拿破仑的霸权图谋时,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权力的差异、对威胁认知的不同以及在建立反霸联盟中遭遇的“集体行动难题”,导致追随拿破仑帝国以及不介入政策成为欧洲大陆上其他国家更为常见的行为反应。^①虽然,最后拿破仑的霸权图谋惨遭失败,欧洲大陆又恢复了均势,但如果没有“离岸平衡手”英国为克服“集体行动难题”而付出的特别努力,我们将无法肯定欧洲会不会再次出现一个“神圣罗马帝国”。

^① 关于拿破仑战争时期欧洲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请参见韦宗友:《制衡、追随与不介入:霸权阴影下的三种国家政策反应》,复旦大学博士论文,第四章。

作者简介

冯惠云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师,1994 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获英语语言文学学士学位。2002 年和 2005 年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分别获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学,代表作有“Crisis Deferred: An Operational Code Analysis of Chinese Leaders Across the Straits,” in Stephen G. Walker and Mark Schafer, eds., *Beliefs and Leadership in World Politics* (Under contract with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

电子信箱: huiyun.feng@asu.edu

漆海霞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博士生。2000 年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毕业,获政治学学士学位;2003 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毕业获硕士学位。

电子信箱: qhx03@mails.tsinghua.edu.cn

韦宗友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师。1998 年南京大学历史系国际关系史专业硕士毕业,2004 年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毕业,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理论、美国国家安全与战略。

电子信箱: wzy82@yahoo.com

钟振明 同济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师。2003 年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毕业,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理论、美欧联盟关系和国际安全问题。

电子信箱: zhongzhenming@mail.tongji.edu.cn

刘丰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硕士研究生。2004 年南开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本科毕业,获政治学学士学位,研究兴趣为国际关系理论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电子信箱: liufeng00@mail.nankai.edu.cn

张睿社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教授。1997 年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理论、美国对外政策与中美关系、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电子信箱: rzhang@nankai.edu.cn